

传记丛书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

第二輯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 编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

第 2 辑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 编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

北京文海出版社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号）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开本 117/8印张 298 千字

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册 定价：1.50元

图书分类号：K820·7 统一书号：11201·5:2

责任编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中明 毛华轩 刘 宣 刘 作
李希泌 陈翔华 杨殿珣 金恩晖
郭建文 郭铁城

前　　言

传记丛书《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将陆续分册出版。

我们编辑本书的目的是：1. 比较系统地介绍我国当代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以便传播经验，并供青年读者借鉴，繁荣学术事业，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化。2. 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料，供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参考。3. 为图书馆工作者提供当代学者及其著译情况的参考工具书。

为了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征集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从事研究工作、教学工作和有关的专家、学者撰写自传或传略，请惠寄给我们。学科的范围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军事学、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图书学及其它有关学科。

我们也欢迎学者为已故的当代著名专家撰写传略惠寄给我们。内容包括已故专家的经历、治学经验和学术上的成就等等。并请附已故专家的相片和著译目录。

我们编辑本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尊重学术民主。惠稿文责自负。

丛书将按收稿先后分册出版。每册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先后协助本书组稿、编校工作的同志（按姓氏笔划为序）有：于乃义、王义耀、王立兴、王经帮、王恩保、刘乃和、江明、江柘舟、苏双碧、李孝友、连珍、吴光正、邱克勤、张铸、张兆林、陆坚、陆宏基、陈允吉、陈金陵、陈熙中、

周雷、胡世厚、胡永钦、宣继莹、姚克夫、徐自强、高帆、高峰、栾星、曹殿举、彭黎明、富丽、臧嵘等。

本书的征稿、编辑工作，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得到有关领导机关和学术部门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工作中一定会有缺点错误，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录

方国瑜	略述治学经历	(1)
	附著作目录	(5)
王 瑶	自 传	(7)
	附主要著作目录	(10)
吕振羽	治史道路	叶桂生 刘茂林撰 (11)
	附著述系年	刘茂林 翟清福编 (56)
归润章	我走过的路	(79)
	附主要著作目录	(87)
朱士嘉	自 传	(88)
	附著述简目	(94)
朱智贤	自传及著作简述	(96)
孙常叙	自学纪程	(102)
	附著作目录	(109)
李 达	生平事略	《李达文集》编辑组撰 (111)
	附著译目录 (初稿)	曾勉之辑 (131)
杨公骥	自传及著作简述	(145)
李霁野	自传及著译简谈	(176)
何 洛	我的简历	(185)
	附著译简述	(186)
张志岳	自 传	(188)

	附论著要目	(194)
张岱年	我的学习经历	(197)
	附著作目录	(203)
单士元	自传	(204)
	附主要著作目录	(207)
周传儒	自传	(209)
	附著作目录	(224)
罗福颐	僕翁七十自述	(225)
	附著作目录	(234)
罗志如	自传	(240)
	附主要著作目录	(246)
金景芳	自传	(247)
	附著作目录	(256)
赵通持	略传	林旭昭整理 (259)
	附著作目录	(268)
赵景深	自传及著作自述	(272)
赵佩生	我的自传	(276)
	附著译目录	(283)
顾随	我的父亲顾随	顾之京撰 (285)
	附著作目录	(301)
唐圭璋	自传及著作简述	(303)
钱仲联	自传	(310)
	附著作目录	(316)
黄焯	自叙	(319)
	附主要著作述评	(325)
温公颐	我研究哲学的经过	(327)
	附主要文章目录	(342)

傅庚生	自传	(344)
	附著作目录	(351)
雷石榆	平生蹉跎一片心	(352)
	附主要著译目录	(367)
戴逸	自传	(369)
	附著作目录	(372)

方 国 瑜

略述治学经历

国瑜生于边僻之乡，儿时因疾病折磨，资质粗笨异常，习惯于孤独生活。年九岁始发蒙，因不懂汉语，只用本民族（纳西）语言讲解汉字，颇感困难，读书小学、中学时，常促居小屋，终日伏案咿唔。稍长，自署书室曰“因而好学斋”以自勉。假日，从和让（德谦）先生习诗词者六年，未尝有佳作。将远游，先生临别赠言，诵《王渔洋诗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句，谓瑜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而肯勉力，“学”、“理”可就；一生功力，能为学人，不宜为文人。此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矣。

公元一九二三年至北京升学，多闻议论，胸襟开扩。时“整理国故”之风甚炽，乃习考据学。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因一场大病，休学二年，复学读本科。一九二四年先后从钱玄同（疑古）、余嘉锡（季豫）、马衡（叔平）诸先生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且得高步瀛（阆仙）、吴承仕（检斋）、黎锦熙（劭西）诸先生启发教育，稍知读书门径，每有论述，发表于期刊，亦有存稿（有可取者，已编定《广

韵声汇》一书及《因学斋杂著》五种)。又先后从陈垣(援庵)、梁启超(任公)、杨树达(遇夫)诸先生治史地之学,钩稽故实,发微阐幽,且多读西域、南海译著,增益新知,亦有述作。至一九三三年,已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复(半农)先生催促瑜回乡习纳西族象形文字。秋间过昆明,获晤袁嘉穀(树五)先生,询所学,蒙赞许,纵论滇人旧学,亦颇谓然。时周钟嶽(惺甫)、由云龙(夔举)、赵式铭(星海)、方树梅(臞仙)诸老辈纂修《云南通志》,鼓励瑜专心本省文献,意有所动。既至丽江习纳西文字成。次年复过昆明,携《云南备徵志》、《滇系》诸书,六月抵北平。数日,刘半农先生病歿,将整理纳西文字,无从请益。友人董作宾(彦堂)介绍至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治语言学,编写《纳西文字谱》。居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甚富,得纵览之。南京国学图书馆多善本书,时往假读,约一年间,辑录云南地方史资料。是时有中、英会勘滇缅未定界之议,痛切清季外交,丧权辱国,多作文议论,发表于报刊。所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谒章炳麟(太炎)先生求教。复谒李根源(印泉)先生,以云南史请业,颇蒙教诲,谓瑜所论界务多空洞,当亲履边境,研究地方史事亦甚有益,乃以参与界务交涉,一九三五年九月赴滇西边区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于一九三六年夏归至昆明,因树五先生强留,教读于云南大学,至今已四十又四年矣。其初,授课之余,致力研讨云南史地之学。自一九三八年以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订、续修之职。分纂建置沿革、金石文字、宗教、族姓诸目,其余亦多参加讨论。又协助李印泉先生编辑《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自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内地大学及研究所播迁至西南,加强抗战大后方,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瑜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友好主办《西南边

疆》杂志，出版至十八期而辍。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瑜主其事，筹资编印丛书，先后成十一种。一时各地以研究边疆问题相号召，多有专著。瑜研究云南史事已有集稿，拟作专书，然分目既多，颇感繁杂，成稿者尚少。

我国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地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边地长期处于落后阶段。历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基础，秦汉以来有内郡、边郡之分，隋唐以来有内州、边州之别；此乃政权形式不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羁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发展延缓。旧史家倡“异内外”之说，发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等反动观点，为统治者服务，史籍记录缺略不实，且多诬蔑之辞，如班固《汉书序传》说：“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用“外”、“别”、“殊”之贬辞，历来史籍如此。故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亦甚少。至近世始稍改变，则因殖民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史地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慨愤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之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抗日战争期间虽有述作，成就亦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边省建设，为旷古所未有，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亦大改观。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材、出成果。乃于是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

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惟限于理论水平低，知识亦疏陋，数十年间积稿虽多，发挥新意而大都未惬于怀，且近岁已体力不及。盖瑜五岁时因扑地，右眼受外伤，从此，两眼红肿，视力模糊，深受其苦。二十岁至北京获治，恢复正常。至六十岁老眼衰退，有加无已，七十岁已甚严重，出外求医无效，中西医皆言将继续恶化以致失明，但尚有三、五年可用。念此生勉力治学，已有积稿而未经编定，将至一无所成。乃自一九七三年春清理、改造旧稿，稍有可取者编录定稿，得友人誊写清本。五、六年间竭尽心力目力，完成数种，共四百余万言。其数量较多者有《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及《滇史论丛》。前二书已有条贯，分题考之、说之，而《滇史论丛》尚未竟业。《论丛》率为散篇旧作，有专篇、专条及专书之部分可取者，其中多已发表于期刊，或刻印散发，亦有未刊手稿，已誊写约百万字，将分辑编定。今看书写字极感困难，期得他人，帮助整理继续编入。

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但自来被歧视、忽视，至今凌乱亦甚。搜集整理，分析批判历史资料，揭示历史真相，仍然是今天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

一九七八年春，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党中央号召：“要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所有学科意气风发，奋勇争先，制订规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尽力。云南地方史之研究亦应大有作为。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

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故与研究室二、三同道共商，拟定八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规划，力图将此科目提高到新水平。顾此科目，原是底子薄，且已往限于私有制个体小生产方式，较之其它科学处在更落后阶段，须急起直追，则惟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始克有济。所拟四项课题为此科目基本建设打下坚实根底，使有志于此者得到充分利用，贯彻实事求是原则，长期共同奋斗，发扬而广大之，非仅一人一时之事也。瑜年迈力衰，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者黾勉从事。犹盼完成八年规划之后，尚得余年，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勿负此生矣。

公元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丽江方国瑜谨识
时年七十有八

方国瑜著作目录

广韵声汇（稿本）

困学斋杂著五种：

广韵声读表（稿本）

隋唐声韵考（大多数已先后在期刊上发表）

慎子考（稿本）

慎子疏证（《金陵学报》发表，并收入《古史辨》）

论学存稿（多数已先后在报刊上发表）

（以上为三十岁以前所作）

滇西边区考察记（一九四一年）《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印本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一九五八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印本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约八十万字，已交中华书局排印）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约一百万字，已交中华书局排印）

滇史论丛（多数已在期刊上发表，约一百万字，已有部分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
纳西象形文字谱（凡四篇，云南人民出版社印）
彝族史初稿（约五十万字，已交四川人民出版社排印）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约十二万字，已交文史资料委员会排印）
云南民族史讲义（约六十万字，油印本）
云南金石文物题跋（约五十万字，稿本）
讲稿数种（油印本）
论文若干种（稿本）
云南史料丛刊（主编，已成约五百万字，油印本）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

王 瑶

自 传

王瑶，字昭琛，山西平遥县人，汉族。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生。少年时在本县读小学，一九二八年入太原进山中学读书，一九三一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一九三四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在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发表文章，并参加北平“左联”活动。一九三六年曾任《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迁至云南昆明，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导师是朱自清先生。研究院毕业后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讲师、副教授。一九五二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授，教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现在的职务是北京大学教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另外有关学术活动的兼职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和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由于长期在大学教书，我的研究工作和所写的东西都是与教学任务有关的。解放前我教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

解放后改教中国现代文学，因此我写的东西也都属于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范围。由于理论修养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这些书籍或文章的质量都不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我自己也并不满意，实在没有什么成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可以介绍。一个人所经历的道路总是要受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前辈的影响，在我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三十年代初期，我受到了当时左翼文化运动和鲁迅著作的很大影响。由于自己缺乏创作才能和生活积累，当时又正在学校读书，于是便把文学研究工作当作自己的专业方向，而且努力从鲁迅的有关著作中汲取营养。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论的发展》，研究院的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就都是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引导和启发下进行研究的，还曾写了《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专题论文。由于十分钦佩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我决定从汉魏六朝一段来开始自己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赞许。解放前我在清华大学担任的课程也是“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汉魏六朝）”、“陶渊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一类课程。自己虽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向有很大兴趣，而且也常常注意和关心文学创作的发展情况，但由于当时的大学中文系不设置这类课程，所以只是业余涉猎性质。全国解放以后，在教学改革中，“现代文学史”成为中文系的一门主要课程，当时教师又十分缺乏，遂适应教学需要，改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并着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我的研究范围虽然有所变化，但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我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的某些精辟的见解和论断是值得学习和体会的重要文献，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著作以及他的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我以为不论是研究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和分析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指导意义的，至少我自己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来看待的。鲁迅根据他长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经验，感到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之后，才“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三闲集·序言》），更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因此谈到所谓“治学的经验和方法”的话，我以为鲁迅的经验和著作才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典范。我自己研究的范围或选题虽然屡有变化，但几十年来一直是照着这样的目标来努力的。不过由于学术水平的限制，迄今不仅始终停留在“心向往之”的阶段，而且还常常发生东施效颦的现象；贻笑方家，有负读者，这是使我很不安的。但愿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努力，有所弥补。